



构建佛教新型的师徒关系

◎ 本性

佛教团队中,大而分之,有两种师徒关系。一为僧团中的师徒关系,一为僧伽与俗家弟子的师徒关系。虽然宗教的本质不变,其师徒关系的本质也不变,但佛教是不断自新的宗教,师徒关系在不同的时代也显现不同的特征。时间进入 21 世纪,今天的师徒关系该怎样才好?探索过去,知道现在;总结现在,预知未来。本着忠于佛教根本精神,结合当代佛教界内外因缘的实际,本文拟就新时期应该具有的良好师徒关系内容作些抛砖引玉式的探讨,以期巩固佛教中具有优良传统的师徒关系,并随时代之机,构建新型的师徒关系,尤其在僧俗之间。从而拓展僧俗之间的沟通渠道、互动方式,增添教团的凝聚力和鲜活力。

一、在信仰上,师徒关系是圣人与凡人的关系

宗教的本质在于信仰。信、愿、行是佛教信仰基本的构架。信为一切功德母。信徒之所以称“信徒”,就是因为是“信仰之徒”。信徒之所以信仰,是因为他信仰佛陀、佛法、僧团。信此三宝,这是根本。也许,僧人未必是圣人,但他显佛功德、代佛宣法,是佛教的代表和象征,虽非圣人却非非圣人。为此,僧伽与信徒的关系,首先,应是圣人与凡夫的关系。信徒景仰与崇敬僧人,维护与供养僧人,视师傅为诸佛菩萨之再世。在巴利语系佛教的僧俗师徒关系中,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二、在传承上,师徒关系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

宗教多强调传承、强调法源,即注重师承。虽然,

没有传承同样可以得法,但那是上等根器者才有可能。上根者可以自悟,但一般的凡夫,只有依靠师承。有了师承,就有了法脉。这是一种以心印心、以法传法、以学教学的方式。在这里,信徒是学生,师傅是老师。师傅传道解惑,并给予徒弟宗教上的合法传承,也可说给予了宗教上的生命。正因为这样,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要以佛心为己心,以师志为己志。僧团中,师傅为徒弟剃度、受戒、传法;在僧俗上,师傅为信徒授三皈依、授戒、加持,这就是传承理念在现实中的实践例子。

三、在学修上,师徒关系是同参道友的关系

在佛教,三分师徒,七分道友。教内常用词如“同参”、“同修”、“同道”,也体现了这一点。因为,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各有根机,各有因缘。因此,要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藏传佛教史中,就有达赖与班禅互为师徒的说法。为此,信徒就未必在修学上不如师傅。当年维摩诘居士胜过一些僧人就是例子。既然信徒有可能青出于蓝胜于蓝,那么,以此而推之,师傅坐下来听信徒说法也未尝不可。信徒毕竟是大多数,要释放他们学修佛法的积极性。再者,也因为师有所短,所以,应鼓励至少不反对信徒有多师,善财童子不是也五十三个参了吗!

四、在生活上,师徒关系是兄弟姐妹的关系

人是五蕴之躯,需要衣食住行。人生难得,必须生存。再高妙的佛法,也要从最平凡的生活中体味。生活,

也是佛法的一个部分。为此,生活之美,生活的和顺和秩序,便显得重要,否则,如何去推动佛法的事业。生活之花需要浇灌,师傅的生活需要信徒的护持供奉;信徒的生活也需要师傅的指点关心。佛陀很关心弟子们的生活,甚至为病比丘熬药侍候,这是很好的榜样。在生活上,师徒关系应如兄弟姐妹。兄弟姐妹,血脉相连,亲情在;师傅徒弟,法脉相连,法情在。为此,他们当有悔互忏、有恩互报,同时互帮互助、互促互进。我认为:师徒永远是一家人,教团永远是僧俗共同的家。

五、在弘法上,师徒关系是同事的关系

僧人把俗务放下,投入住持佛法的事业中;信徒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从事护持佛法的工作。共同的目标,把我们连在一起;三宝的胜缘,把我们结在一起。僧俗的弘法意义在于延续和弘扬佛法。为此,共同致力于弘法目标的师徒,应是同事的关系。他们在工作上协作,事业上共创,他们发扬民主的作风,尊重各自的思想自主性和文化多元性,为了一个佛日增辉、法轮常转的共同久远愿景,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了义经不依不了义经、依智不依识。

六、在管理上,师徒关系是将军与士兵的关系

宗教虽然是形而上的,做人的思想工作,但也需要有严密的组织来保障。组织,即教会或宗教场所,他们需要有效的管理,以此发挥其效力,凝聚人心,团结僧俗。有管理,就得有制度。信徒是群众性的,有其散漫的特征,需要有组织的约束并给予训练。教团与军团应该无异,教规的粗细繁杂及教制的完整证明了这一点。为此,教团中也需要有权威,这权威的角色当然落在了师傅的身上,没有权威,教团就没有纪律性,而宗教强调戒律的严肃性。为此,在管理和戒律问题上,信徒对师傅的态度应当是服从。也可以说,在管理上,师徒关系就是师徒关系,不是其他。

七、在实证上,师徒关系是拐杖与瘸子的关系

对瘸子来说,要行走,需要借助拐杖。拐杖是助他行走的工具,但不是行走本身,行走的真正动力和源头在于瘸子自己。自己不行走,持拐杖也没有用。瘸子用拐杖,一旦不瘸了,就可以扔掉拐杖;一旦瘸子到达

了顶点,也不再需要拐杖,拐杖只是他到达目标的手段。如果说,信徒是瘸子,那么,在实证上,师徒就是把拐杖。套用一句话,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关于“师傅领进门”观点的说明:

佛教的宗教观告诉我们:佛陀和僧侣的角色,一是导师,二是医生。导师的任务是指路,信徒是迷途的凡夫,导师给予指明方向,示以实证的步骤和解脱的方法。而这条路和这个方向,是佛陀曾经实证过的,确认无疑的。对僧侣来说,这条路承接自佛陀之路,方向是佛陀指明的方向,他是代佛指引,在大方向上不会有错。而医生的任务是治病,信徒在没有成圣前都是凡夫,凡夫就有贪瞋痴等诸病。佛陀和僧侣给信徒灵丹妙药,要除治其病,康复其身心。从佛教的宗教观可以看出,佛陀和僧侣是拐杖的作用,给你妙药,给你方向。

关于“修行在个人”观点的说明:

佛教认为,人人有佛性,这佛性是成佛的基础和根本。又认为,世间一切事与物皆因缘生因缘灭。基于因缘观,所以有了因果观,由此推论命自我立,自己的未来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自己掌握。要有美好的命运就要自己创造美好的因缘。“迷时师度,悟时自度”,佛陀与师傅只是你的增上缘。有美好的因缘,自然结出美好的果实。为此,佛教非常强调个人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也就是说,发挥和依靠自力的重要性。佛陀与僧侣指给你路,你不去走,不能到达目标;医生给你妙药,你不去吃,你不能康复。师傅启发你信仰、给你传承、授你学修的智慧,但你不亲自去实践,也就无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画饼如何可以充饥?所以,瘸子要站起来走出去,最终靠的还是要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证。

八、关于“师傅领进门”中领的方法

作为师傅,主要是身教,其次才是言教。佛陀就是自律和言行一致的典范。对信徒,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操。教育的出发点要远,目标要高。名师难遇,但好信徒也难求,都靠引导,引导中纠正。

对信徒,要平等对待,要因机逗教,即因材施教。因此,要了解学生,知己知彼。信徒根机各不相同,因此,教化中要有耐心,单凭热忱是不够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即学修一体;要给任何人予机会,不局限于信徒;要慈爱信徒;要有民主的作风,言行允许信徒存疑,经得起信徒的检验;对信徒要有信心;要以常不轻菩萨的精神看待每个信徒,因为,他们都是未来佛。在教化上,要提高教化的艺术,拓展教学的内容,讲究教化的效果,以效果检验方法。这样,才堪为人天师表啊!

九、关于“修行在个人”中修的方法

佛教中有“闻思修”和“戒定慧”之说。从学上说,就该闻思修;从修上讲,就该戒定慧。闻思修是理论即信解,戒定慧是实践即行证。为此,又有“信解行证”的说法。这些,都是学修次第或者说学修方法的很经典总结。

在此,我们也可看出,谈修,首先要基于学。那么,谈学,又基于什么呢?那就要具三心,即惭愧心、感恩心、敬畏心。惭愧自己学之不够修之不够,从而知耻而后勇;感恩他人给我的多,社会给我的多,三宝给我的

多,而我付出的少,心存感激;崇敬三宝及诸圣贤,敬畏鬼神等六道众生,有所敬有所畏,对世间圣凡心怀敬畏。有此三心,就心胸开阔、动机端正、思路明确。在这基础上,去闻思修,去戒定慧,去信解行证,就会有更佳的效果。

以上所言之修,多侧重在求慧上,其效果,是获得智慧。虽然,现代人很缺智慧,求慧很重要,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现代人更缺福报。为此,修福也是必须。修福之路当从五戒、十善、四摄、六度等走出。福慧双修,佛道上双轮飞驰,则佛国净土不远矣。

当然,新型师徒关系的基本构架,远不止于以上所述之九点。说是新型关系,其实佛陀时代早就提及并已如此,只是,我们以新时代的视角去审视并作新的诠释。在大小乘经典中,述及相关问题的只言片语,并不少见。为此,我们应鼓励僧俗两界用心去给予整理和总结,使老干茁新枝,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促进当代佛教界新型师徒关系的构建,为佛教界赢来更充盈的生机。

第八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通过《京都宣言》

据新华社电(记者吴谷丰)为期4天的第八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29日下午在日本京都闭幕,会议通过的《京都宣言》呼吁世界各宗教团体和宗教领袖为解决地区冲突、消除贫困、维护世界和平而采取积极行动。

宣言说,我们生活的世界存在着各种形态的暴力,许多人被卷入暴力冲突并被夺去了性命,弱势群体受到的暴力侵害更为严重。为此,各宗教团体应当通过开展相互合作,在防止和制止暴力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宣言指出,作为世界宗教团体的最大联合体,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现已成为致力于实现和平的各种宗教的共同代言人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动者。与会者以开展宗教间合作为信念,为消除一切暴力、保护所有生命,紧密团结在一起。

与会者决心为制止战争、建立更加公平的社会而奋斗。各宗教团体要重视有助实现正义与和平的教育,并致力于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会议还制订了“行动计划”,呼吁各宗教团体反对那些为制造暴力滥用宗教的行为,促进宗教团体之间的合作,加强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的网络,以便努力消除疾病和贫困,实现世界和平。

第八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是26日在京都开幕的,会议的主题是“不同宗教为了和平而聚会:消除一切暴力,共同保护所有生命”。约10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宗教界人士,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和市民团体的代表约1500人与会。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广元率中国宗教界代表团参加会议。

(2006年8月30日人民政协报)